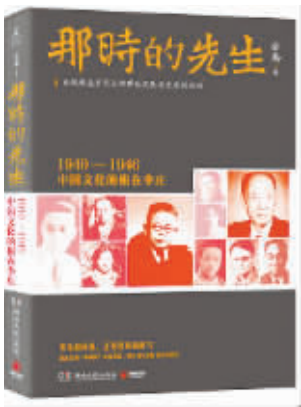


李庄的艰难岁月



那时的先生
作者：岳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年7月第1版

编辑推荐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大批学术教育机构的学者、师生被迫向长沙、重庆、昆明等地区迁徙。1940年,因战事趋紧,同济大学师生迁往川南古镇李庄,继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先后辗转而来。一时间,众多一流学者和大批珍贵文物古籍汇聚李庄——这个被傅斯年称为“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作品以纪实的手法,深沉的情感,酣畅的笔墨,全景再现了在李庄的学者们艰苦卓绝的生活与学术历程,突出刻画了霸气的学人领袖傅斯年、耿介的考古学大师李济、苦心孤诣的建筑学泰斗梁思成等人的鲜明个性,以及他们面对贫病守望相助、穷且弥坚的精神风骨。

李约瑟走后,李庄古镇复归平静,只是平静中更添了一分寂寞、孤独与忧伤。由于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活动空间过于狭窄,人文气息不断凋零飘散,最终导致流亡此处穷困潦倒的教育、科研机构人员失去了初来时的热情与向心力,交往中渐渐互生芥蒂,变得冷漠,甚至成为仇寇。

“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此为西南联大在昆明组建后,陈寅恪前往任教时所作的诗句,借以形容当时的生活状况,知识分子面临的窘境。如七七事变前每月支350元薪的教授或研究人员,到了1943年,支取薪水按当时生活指数折算,只相当于战前的13.60元,且越往后折合越少,几乎形同一堆废纸。面对钱不再值钱,物价一日三涨,“中统银钞入手空”的残酷现实,国民政府决定对公教人员发放部分薪水,另一部分由食米代替,称为“米贴”。

1943年3月1日,在李庄的史语所人员都接到一张由会计室送达的表函,上书“顷接总办事处函,关于教职员及工役食米,拟依据需要发给实物。前规定表式,即请尽速填寄处”。通行了几千年的货币制度,如同滚滚流动的江河之水,在战乱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双重挤压下宣告枯竭,干枯的河床再度掀起漫天风沙,社会流通机制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商品流通的起点。史语所同人以及其他几家科研机构人员,以自己殚精竭虑的精神成果,换来的就只是一堆大米,且有一部分米总是散发着霉烂气味。

很快,越来越多的人染上了疾病,有的竟至一病不起,甚至登了鬼录。在昆明时经常与傅斯年就某一学术问题唇枪舌剑,并总占上风的史语所第一“勇士”董同龢,当年结婚时的皮鞋早已卖掉,穿一双自制的草鞋度日。1943年6月2日,他上书傅斯年,曰:“同龢之子及妻先后患痢,适值本所医师离所,闻本年曾订有临时辅助法,兹同龢之情形未悉仍能适用否,恳请设法予以救济。”

董氏向傅斯年诉苦,而此时的傅氏已到了靠卖书生活的境地,可谓有苦无处诉。据史语所研究人员屈万里回忆:这个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就卖书度日。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了买书上,可以想象,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肯卖书的。而每次忍痛卖书换来粮食,除解决自家的燃眉之急,还周济史语

所的下属朋友。在史语所董作宾家庭人口最多,迁往李庄后,生活几无保证,傅斯年便拿卖书的钱给予接济。

面对全所人员越来越艰难的生存条件与他们发出的“救济”呼声,向来“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忍辱负重,与当地官府饱食终日的官僚交涉,有时不惜打躬作揖,以求援手。傅斯年留下的遗物显示,这一时期,他曾用地出产的竹纸亲笔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写过一封求助的长信,信曰:

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场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敝院在此之三机关,约(需米)一百石,外有中央研究院三十石,两项共约一百三十石,拟供应之数如此……夙仰吾兄关怀民物,饥溺为心,而于我辈豆腐先生,尤为同情——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泻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有求于父母官者。

此种穷愁的生活与繁重的工作状况,使傅斯年高血压病再度发作,黑发急剧变白。当时在李庄史语所读书的青年学者王叔岷回忆说:“傅先生有时跟我聊天,忽然他不知说到哪里去了,他叹道:‘唉!我这个将死之人!’他的头发愈来愈白了,他说:‘我没有经过中年,由少年就跳到老年了!’”许多年后,当王叔岷在台湾孤岛回望大陆并怀念李庄生活的时候,不无深情地说:“史语所及文科所,不是傅先生的魄力,哪能辗转数千里迁移至幽静的深山里,毫无空袭顾虑,为国家保全珍贵文物,更培养学术人才!一切烦恼困苦,傅先生一人担当,他又患血压高,焉得不速老!”叔岷之言,确属实情,无怪乎李约瑟到来时,把只有47岁的傅斯年估成了55岁——这恰是傅斯年在台湾孤岛死去时的年纪。

面对板栗坳居住的一群男女学者兼老人孩子的穷困,傅氏在上下求索、四处声援救济的同时,不忘在得到点滴成果时苦中作乐,难得地幽上一默。王叔岷回忆说:“所中同仁都很清苦,很少肉食。有次傅先生在重庆筹得一笔小款,附一封信,托人带回来分赠同仁,要职位低人口多的,分得

多。因此职位高的就不高兴,出怨言。傅先生附信中已经提前说:‘你们分得这笔钱后,有的人一定大吃,有的人一定大骂。’傅先生就是这样风趣。”

除了粮食物资需要“救济”,傅斯年更知道缺医少药的严重后果,稍有不慎,即致贻误人命。而此时,原来聘请的一位医生因无法忍受史语所的贫困,辞职远去,傅只好又从外边聘请一位姓张的医生来为大家服务。但这位医生令所有人员大失所望。据石璋如回忆说:“医务所的陈设非常简单。以前医务所的萧医生,与同人、眷属处得很好,病理讲解也很清楚,护士小姐也很亲切。后来萧医生离职,换成绰号‘开水先生’的张医生,因为许多同去看病,张都要说喝开水,久而久之医务所就门可罗雀,他也被起了绰号。”

由于“开水先生”的看家本领就是“喝白开水一杯”,加之医疗条件太有限,史语所同人的病患越来越多,形势一发不可收拾。1943年9月23日,主持工作的董作宾向在重庆参加会议的傅斯年拍发急电,称:“(汪)和宗夫人产一女,夏作民(南按:作铭,即夏鼐)先生病,陈文永君之小孩已夭折。”

一个月之后的11月11日,史语所人类学组主任吴定良再次致电傅斯年:“弟目前经济处于绝境,小女之医药费拟向红十字会辅助研究院经费中申请,恳请吾兄予以惠助。”董与吴的电报,都是恳请傅斯年尽快设法换医生和购买药品,以扼制病魔的无休止大规模侵袭蔓延。焦虑不安、坐卧不宁的傅氏尚未想出解决办法,史语所一组研究员劳榦的母亲又一命呜呼了。据李庄板栗坳一李姓姑娘在许多年后对前往采访的作家岱峻回忆:劳榦的妈妈劳婆婆是个小脚女人,从外地投奔儿子来李庄板栗坳时还看不出有多老,只是每走路颤颤巍巍的,嗜辣,讲一口不好懂的湖南话。来李庄没几年就死了,是死于水肿。劳婆婆先是吃不下,肚子鼓一样地胀。因他们的那个医务室没得什么药,医生只让喝开水。开水喝进去,肚子就更胀得不行,白受罪。没得法,就找我们给他扯草药。一篮篮的夏枯草、车前草、金银花,用来煎水喝。喝进去又拉肚,没得几天,一张脸全是绿阴阴的,瘦得僵尸样儿,可怜得很,他的儿子劳榦又着急又没得法。没几天老婆婆就躺在劳榦的怀里咽了气。看着人家把他妈装棺抬走,劳榦站在板栗坳口上哭哑了喉咙。那个可怜,连当地人看了也跟着流

下了眼泪……

在这种穷困哀苦中,傅斯年已被悲惨的现实折腾得精疲力竭。就在这一时期,因经济问题和沟通不畅,李济与傅斯年的公开冲突被引爆了。双方攻伐进退,三十个回合、六十个重手,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终于酿成了关涉多人与多个机关部门的“事件”或称“个案”。

在这一事件被引爆之前,傅斯年与李济之间曾有多次摩擦甚至冲突,但都很快平息,复归旧好。远者不必提及,即如1942年7月28日,李济突然给傅斯年一信,劈头质问:“有人告弟云:兄甚不满意考古组之工作,三组中没有一个人能写报告的。”傅斯年闻后“不胜其惊讶”,立即复信辩解:“弟对何人在何处说此,乞兄示知,弟当对质,以凭水落石出,看弟是否如此说。弟平素不听传闻,然此事既经兄提出,而语意诬弟甚重,故理当弄清楚也。三组工作情形,弟与兄常谈,与人谈,决不出与兄所谈之范围,且少得多,事实上亦只与董、梁二公谈而已。所谓写报告一事,弟平日一贯(贯)主张在发掘报告中少牵引他事,少发挥,一向如此。犹忆写《城子崖》时,弟主张不涉及历史部分,不在报告中与Andersson等书比较。”又说:“弟很觉得在三组青年同事中,写报告之技术尚待陶铸,‘吴、石二位目下似均不能独立写报告’,此乃弟近因染病,而与兄谈过数次者也。我们谈这些事时,并无不同意见。然则此说必有传闻之过。兄勿介意,亦当信弟之无此言也。”最后,傅斯年补充道:“谓吴不能写报告(弟对兄等说过数次),谓石以不能看外国报告而吃亏,云云,亦并不因此而抹杀其长处。”

信中提及Andersson,指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吴,指史语所三组技正吴金鼎;石,指史语所三组副研究员石璋如。傅斯年写毕此信六天后的8月3日,再致李济一函,谓:“前兄手示某君谓弟说三组如何如何,次日兄告弟云,是彦堂所说,弟当询彦堂何时说,彦堂坚不认他曾向兄说此。我说:‘我并无兴趣你说此事否,问题是在乎我向兄说此与否?’此则彦堂固谓弟未说也。此事不必小题大做,请彦堂为我出一证明书,只待我们三人在一处时,再证明我未说此可耳。”

这一或许是因传言过程中误听误判,差点引起大风波的口舌,经傅斯年如此一解释,便不了了之,傅李二人复归以前合作状态。

节选自《那时的先生》
推荐书友：江北区/励总